



exploring the architecture of everyday life, 11e
David Newman

[美] 戴维·纽曼 著 黄腾 译

欢迎光临社会学

(第11版)

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下册目录

第三部分 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与日常生活 / 397

第九章 社会的结构是什么：组织、社会制度与全球化 / 399

社会结构与我们的日常生活 / 401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社会结构与灾难 / 406

社会困境：个人利益与结构需求 / 409

正式组织的结构 / 415

社会学家剪影：乔治·里策尔（George Ritzer）：

社会的麦当劳化 / 419

组织与制度 / 428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美国医疗体系 / 430

全球化与社会制度 / 434

小结 / 444

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麦当劳式去人性化 / 445

本章要点 / 446

第十章 社会阶层化是如何建构而成的：社会阶级与不平等 / 447

分层体系 / 450

关于阶层化的社会学视角 / 454

美国的阶级不平等 / 463

社会学家剪影：迈克·罗斯（Mike Rose）：

工作中的心理状态 / 475

全球发展与不平等 / 499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全球健康差距 / 499

小结 / 508

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在贫困线上下挣扎 / 509

本章要点 / 510

第十一章 不平等是如何建构而成的：种族与民族 / 512

种族与民族：并非只是一个生物学问题 / 516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为什么奥巴马不是白人？ / 522

受压迫与不平等的历史 / 526

种族与民族关系 / 535

社会学家剪影：乔·费金 (Joe Feagin) 和

艾琳·奥布赖恩 (Eileen O'Brien)：

富有的白人男性对种族的看法 / 541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

种族优势与占主导地位的黑人运动员 / 552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居住隔离——住宅歧视 / 558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

种族实验对象与医疗不信任 / 565

全球视角下的种族主义 / 575

小结 / 578

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隐形偏见无处不在 / 580

本章要点 / 581

第十二章 不平等是如何建构而成的：性与性别 / 582

个体层面的性别歧视 / 584

社会学家剪影：托马斯·李纳曼 (Thomas Linneman)：

《危险边缘》中的性别与升调语式 / 588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军队中的性虐待 / 592

性别歧视意识形态：生物决定论 / 604

社会制度与性别不平等 / 607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媒体形象真能伤及你的健康？ / 614

全球对女性的贬低 / 632

小结 / 636

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两个人的家一个人的家务 / 637

本章要点 / 638

第十三章 人口统计动力学是什么：人口发展趋势 / 639

出生世代的影响 / 643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不同世代之战？ / 650

人口统计动力学 / 651

美国的人口发展趋势 / 664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移民政治的特殊性 / 667

小结 / 674

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我们是否真的老无所依 / 675

本章要点 / 677

第十四章 变革是如何建构而成的：重构社会 / 678

社会变迁 / 682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儿童运动上的父母压力 / 684

社会运动 / 697

再论社会学的想象力 / 714

小结与告别 / 718

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 719

本章要点 / 720

参考文献 / 721

开放。食物还是会被送到杂货店货架上。市政服务也仍在提供。就连股市也并未崩盘。我们都只是照常过我们自己的生活，顶多也就是偶尔停下来看一眼政治舞台上的表演，或者是偶尔与朋友、家人和同事谈论一些政治话题。

那么，为什么美国没有在大选的创伤中崩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本书的一个重要概念上：社会结构。尽管社会情绪起伏不定，悲观预言时有浮现，对抗冲突之举常可闻见，但是，政治体制依然完好无损。无论我们是否认同最终的选举结果，我们的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依然正常发挥功能。从地方选区和竞选组织，到立法机构再到最高法院，所有机制都在继续运转。当然，可以肯定的是，一些个体的动机具有政党倾向。但是，结构本身始终凌驾于这些个体行为之上，从而避免了媒体专家预言的大规模灾难事件的发生。有关人类存在问题一个最大的社会学迷思就是：人类创造出社会结构后，在经验上却不认为它是一个人类的产物。因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高度赞扬个人主义和个人成就的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我们一生中却要花费大多数时间去应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本章重点关注，从地方和全球角度去考察，人们与自己建构和维持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从个体角度去审视社会结构，还要从组织和制度本身的宏观社会学视角切入。从不同的视角去看问题，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就会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

社会结构与我们的日常生活

也许你还记得第二章中提过，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是一种超越个体层面之上的社会框架，它提供了社会背景，让个体相互之间可以进行互动，建立关系。它包括组织、团体、地位和角色、文化信念及

制度，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秩序和可预测性。“社会结构”这一概念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我们的个体生活与社会运作模式是有规律性的。如果我们认为社会毫无规律可言、所有事物都是偶然发生的，也就不可能从人类的行为中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

放眼望去，社会结构随处可见。就拿影响我们高中求学经历的社会结构因素来说。在美国广义上的教育制度中，存在各种社会结构元素：

- 组织：美国教育协会、州教师协会、认证机构、地方学校董事会、学区教育局等。
- 团体：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年级、俱乐部、球队、食堂员工等。
- 地位：老师、学生、校长、副校长、辅导员、护士、秘书、看守人、教练、图书管理员等。
- 角色期望：教学、学习、管教、出题测试、咨询、指导、做饭等。
- 文化信念：例如，相信教育是实现财务成功的主要手段，相信教育使得复杂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相信教育使得一个科技发达的社会成为可能。
- 制度化规范：如期望，期望每个人都能念书至少念到 16 岁；如校规，校规规定什么样的行为是可接受的（教室内不得乱跑，课堂上不许尖叫，放学后不得离校，等等；Saunders, 1991）。

整个教育体系结构是一种实体，可以决定〔人们在〕生活中的机会和选择。你可以选择：选修哪门科学课程、高中毕业是否接着上大学、进了大学学什么专业，但是，你心目中大学的招生政策，以及大学学历对你日后求职有何影响，就不是你能控制的。你现在之所以会读我这本书，并非因为你对本书内容有多喜欢，而是对你身为大学生的一种结构性要求。你心里很清楚，你只有顺利毕业才能提升你找到好工作的机会，而为了顺利毕业，你在班上必须得到一个好成绩。为了得到好成绩，你必须熟悉教材才好应付考试。此时的你，可能更想做许多别的事情，例

如读一本世界名著，看电视，发短信，刷微博，写博客，睡觉，仆街（**planking**，指脸朝下趴着，保持一种僵硬笔直像厚木板一样的姿势），或者只是一个人发呆。但眼下为了应对大学生活对你提出的更迫切的结构性要求，你的所有这些个人喜好都不得不暂且放到一边。

教育体系的结构性要求有着更广泛的影响层面。学校如此强调学业成绩、标准化测验结果、班级排名，给学生带来巨大的个体焦虑，以至于实际上有可能会遮蔽学生的学习热情 and 智能成长：

在我们的求学阶段，社会教导我们相信成绩会反映一个人的智力水平。正因如此，我们的动机、学习和个人成长，都比不上实现最终目标——分数[第一]……学校开设的课程，引领我们去模仿老师期望的表现。否则，我们的成绩就会落后[他人]……模仿、竞争和害怕分数倒数，都阻碍了我们的自我探索能力。

(I. Bell & McGrane, 1999, p.2)

这种激烈竞争的氛围，有时会造成个体学生的需求与教育体系的需求不相容。假设你的社会学老师告诉你，只要大家都不缺课，每个人都可以得A。你的直接反应当然会很高兴，因为这一成绩无疑会提高你的平均绩点（GPA）。但要是所有老师都这么做，事情又会怎样？每个学生只要每天正常上课，最后就能以最佳分数毕业。这时你又会有什么感受？你肯定知道这样一来学校声誉会受损，所以你的喜悦也会降低。只要我们的教育体系遵循“适者生存”法则，即只有最聪明或最勤奋的学生才能得到最好的成绩，外界肯定会将上述评分方式视为学校办学能力欠佳。因此，实际上只有维持一种高度竞争的体系，让别人的成绩都比你低，才能确保你的长期个人利益。

除了对你个人的影响，竞争性的教育结构也会影响对学校 and 老师的评估。例如，考虑一下标准化考试的作用。根据2001年颁布实施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所有接受联邦资助的公立学校，必须每年对所有

学生进行全州标准化考试，以确认他们是否有长足进步。如果学校持续未能满足其成绩目标，管理人员就会失去工作，学校则会被接管。如果学生成绩一直不佳，低收入学校就有失去资助的风险。此外，约有十几个州考虑将学生标准化测试的进步情况纳入对教师的绩效考核。面对这些压力，毫不奇怪，越来越多的学校都将它们的课程集中在应对标准化测试上。例如，佛罗里达州的学校，在为期 180 天的学年中，有 60—80 天都花在了测试上，在某些学区，每天都会进行测试 (Alvarez, 2014)。事实上，对展现学生进步的要求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一些教育工作者竟然通过舞弊来提高学生的成绩：

- 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政府特许学校 (charter school, 这种学校专门接收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其运行独立于本地公立学校)，校长指示教师在考试时间查看参加州标准化测试学生的答卷，指出答错的地方。该州最后取消了这所学校的特许权。
- 在休斯顿附近一个地区，老师们在偷看了州科学考试的题目后，对学生们进行了细致的学习辅导 (Gabriel, 2010b)。
- [州府] 对宾夕法尼亚州公立学校的标准化测试结果进行的查验表明，在阅读和数学测试上，89 所学校 (单是费城就有 28 所) 的试卷上都有巧妙的擦拭痕迹和可疑的得分 (Winerip, 2011)。
- 2012 年，厄尔巴索学校 (El Paso school) 的前负责人，因操纵考试分数诈骗学区现金奖金 (由于提高了学区的考试成绩，他一直领取这一奖金)，被判三年半监禁 (Glazer, 2013)。
- 在截至目前最大的一桩丑闻中，一项调查显示，大约十年间，80% 的亚特兰大公立学校中的 178 名校长和教师，通过擦除学生的错误答案用铅笔写上正确的答案，更改了标准化测试分数 (Severson, 2011)。2015 年，因卷入丑闻而被指控的 11 名老师，被判犯有诈骗罪。

即使一切运转正常，社会结构也会引发问题。有时，由于制度本身容易诱发错误或使错误不易被人察觉和及时更正，便会导致一连串事件发生。例如，据估计，多达 25% 的住院病人都会经历某种形式的可预防的医疗过失（**medical error**，又译“医疗差错”）（Landrigan et al., 2010），其结果，导致多达 40 万人死去（James, 2013）。这使得本可避免的医疗过失，成为美国第三大死亡原因，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

有些病人尤其容易受到伤害。据对美国医院医保病人经历的每年例行研究估计，2007–2009 年间，有 70 多万起安全事故和近 8 万起可预防的死亡都归因于医疗过失，如麻醉并发症、用混药物、医疗感染、意外划伤，以及其他各种术后并发症（Health Grades, 2011）。更糟的是，伤害这些患者的过失、事故或其他事件，实际上得到报道的只有七分之一（Pear, 2012）。

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让个体医生或护士为其负责，这一倾向展示了一种压倒性的文化感知，即这些错误是由于个人无能所致。但是，这些看似明显的人类误判或不称职，有时经过仔细观察，却与更广泛的结构性失败相连。对医院 334 起错用药物的分析发现，结构失效应为其中大部分案例负责，例如医生掌握的药物知识少得可怜，患者可以得到的信息严重不足，核准确认正确用药量的体系不健全，没有效率的医院程序（Leape & Bates, 1995）。一个组织估计，系统范围内的护士短缺，导致危险的高病人–护士比例，是每年数以万计的医院病人死亡的原因（引自 Robbins, 2015）。甚至是培训医生的制度方法，可能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一项研究发现，夏季医院整体的医疗护理充足率和质量显著降低，这并不是因为医生为去海滩度假的想法所分心，而是因为到了新的住院医生培训计划的时候。夏天是全新的住院医生（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开始学习如何照顾病人的时间，他们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Young et al., 2011）。这个问题在医疗系统内部非常有名，以至于人们昵称其为“七月效应”（July Effect）。

大约 16 年前，美国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 1999）的一

份报告指出，医院内意外致伤致死案件的起因，超出了个体医护人员的行为。它提议，医疗体系应该在各个层次都建立起安全机制。它建议成立一个全国患者病人安全中心，建立一个强制性的全国通报系统，更加注重在证照和许可中对安全和培训的评价，发展一种“安全医疗文化”，帮助将降低医疗过失列为优先考虑事项。

然而，到目前为止，与一些欧洲国家不同的是，美国并没有联邦监管机构专门监管医院。相反，保护住院病人的健康和安全的，由国家卫生部门和一个负责制定质量标准的非盈利组织：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负责。结果，坏医院很少被关停，也很少因病人的痛苦而受到重大财务处罚（Berenson, 2008）。此外，医院实际上还可能会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利，因为保险公司通常都会支付，因可预防错误而导致的更长住院时间期间的额外护理费用（Eappen, 2013）。

确实也发生了一些结构性改进。例如，为了降低医疗失误的发生率，全美很多医院都采用了电子医疗记录系统，添加了大量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好让医务人员即时了解患者的相关数据、药物信息和案例研究。然而，从2012年到2013年，只有3.5%的美国医院，极大地提升了它们的安全评级（The Advisory Board Company, 2013）。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 社会结构与灾难

人们依赖社会结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当他们面对危及生命的灾难情境时。2010年，33名智利矿工被困在地面701米下超过两个月时间。他们都活了下来，最令人惊讶的是，经受磨难的他们竟然毫发无损。当然，他们的幸存，要求具备惊人的个人耐受力，救援人员的不懈努力，持续供应的食物和用品，来自地上的有效医疗建议，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非常好的运气成分在内。但是，如果没有他们创建的组织良好的地下社会结构，他们可能永远

都无法幸存下来。

在危机初期，被困矿工决定，他们作出的每一个决定，无论多么大或多么小，都要多数投票通过。他们发展出一个明确的权威结构，每个人都分配有特定角色，比如食物组织者、医生、牧师、环境助理、通讯专家和媒体总监。他们指定地方吃饭、锻炼和处理废物。他们分成三个小组，每组 11 个人，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领导和分配的任务。他们遵守常规的日程表，包括吃饭、淋浴、锻炼、打扫“房子”，家务按照时间三班倒（J. Franklin, 2010）。许多观察家都认为，矿工身上展现出的良好状态，可以归因于这一组织。社会结构帮助挽救了他们的生命。

让我们把时钟往前拨到 2011 年的春天，巨大的地震和海啸，摧毁了日本北部海岸，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许多村庄都被从地图上抹去。其中一个这样的地方，是南三陆町市的小渔村 Hadenya。在海啸袭击过后，房屋被吞噬，家人被冲走。桥梁被冲毁，汽车被压碎，船只搁浅。电力和手机服务不复存在。270 名幸存者挤在山顶寒冷的社区中心。他们只有很少一点食物，没有燃料，没有来自外界的消息。军队花了近两周时间才最终赶到。但他们都活着。像智利矿工一样，Hadenya 人民意识到，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就是创建自己的社会结构，迅速重组自己的原初社会：

大水一退……他们就开始按照性别分配任务，女人负责煮水和准备食物，男人负责去找柴火和汽油。几天之内……他们就重新建起一个复杂的社会，有一定的层级和分工，给成员安排日常工作。

他们甚至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作为它和附近五个难民中心的临时政府机构……中心的代表每天碰头，交换供应和分配的任务。（Fackler, 2011, p.A11）

很显然，Hadenya 不是独一无二的。海岸边其他许多小村庄的难民，也都创建有类似的临时组织，从而帮助他们生存下来。这些群体 [的组织] 是如

此成功，以至于当地方政府开始计划将最终所有的幸存者搬入几英里外的临时住房时，官员们意识到，自发的群体组织可能会有一些持久的用处：

[镇长]表示，镇上原本计划让人们尽快搬入新房。现在他认为，最好是让这些组织保持完整，以便帮助人们适应新的和不同的生活环境。

“他们就像一个大家庭，”镇长说，“他们互相提供支持和安慰。”
(Fackler, 2011, p.A11)

但是，在灾难中，社会结构也并不总是救世主。有时它也能压倒个体磨炼其自身意志的最大努力。就拿七年前一场更大的海啸灾难来说，它在南亚和非洲东部害死了超过 20 万人，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世界各地的普通民众承诺帮助受害者，另有 19 个国家承诺数十亿美元的物资援助和军事援助。接近 30% 的美国公民捐款，另有 37% 的人表示他们打算这样做 (Lester, 2005)。灾难发生两周后，慈善组织“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 单在网上就收到超过 1000 万美元的捐款。而平常该组织每个月收到的捐款不过 3 万—5 万美元 (Strom, 2005)。

然而，如此引人注目的个人善行，却遇到了组织层面的阻碍，并险些被毁掉。在海啸袭击过后一到两周，24 个政府救援组织抵达印度尼西亚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结果却发现，小偷和黑市交易者已经提前光顾过这里的废墟。一些受灾地区看不到一个救援人员，另一些受灾地区却挤满了医生和护士。此外，外国军队和救援人员的到来，很快就在印尼政府中引发了怨恨。作为回应，印尼政府对外国救援人员施加旅行限制，以安全问题为由，要求所有外国军事人员在三个月内撤离回国。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班达亚齐，救援组织发现自己置身于内战中：议会反叛军队（美国政府官方视其为恐怖分子）正与一支印尼军队（因腐败和滥用权利而闻名）(Wehrfritz & Cochrane, 2005) 在交手。虽然有成千上万名有爱心和慷慨无私的人前来帮助，但是这些结构性因素却合起来减缓了救援的进度。

社会困境：个人利益与结构需求

尽管社会结构明显会影响个体生活，但是，个体行为也会对社会结构及其稳定性产生巨大的影响。个体有时会合力出气以获取群体利益，有时也会单独行动以争取个人利益。就拿一群想要确保其社区不受坏人光顾的住户来说。他们当然可以通过每个人自行巡守的方式来遏止犯罪，但要是能够大家团结合作，自愿分工轮流“巡夜”，或是分摊费用改善小区照明设施，显然要更加合理而有效。

然而，事实上，人们很少会为共同目标而去从事志愿工作。相反，他们通常采取行动都是只为确保个人利益（J. Cross & Guyer, 1980; Dawes & Messick, 2000; Olsen, 1965）。就以你所在的小区决定通过改善照明设施来确保治安为例。小区物业要求小区住户自愿捐款。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理性的做法是自己不掏钱，因为他们认为别人一定会掏钱。这样他不用花自己的钱就能享受到安全的环境。然而，要是每个人都不捐款，短期看确实能省一些钱，但结果却是小区永远都不会有新路灯，长远来看每个人都会为此受到损失。群体内的每个人只顾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所有人可能因此受害的情况，就叫“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Messick & Brewer, 1983）。

像环境污染等重大社会问题，都可被理解为至少部分是社会困境所致。如果我在高速公路上往车窗外扔一袋垃圾，看上去并没有多大破坏性。但要是每个人都这么做，就会产生极大的危害。

不过，社会困境并非只是自私或不考虑别人这一动机的结果。合法的经济担忧也会创造出它们。例如，在近来的经济衰退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去看病或推迟“选择性手术”（elective surgeries），因为他们负担不起。据美国医院协会（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 2009）统计，60%的医院报告，上一年确定的选择性手术，出现中度或显著减少；55%的医院报告说，（选择性手术的）申请出现中度或显著减少。在个

体层面，延迟这样的手术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医疗后果，如良性囊肿变成肿瘤，因为病人没有接受常规诊断。许多年轻人缺乏健康保险和负担不起医疗费用，就从朋友那里借处方，上网自我诊断，甚至自己给自己接骨（Buckley, 2009）。事实上，医院已有报告，送往急诊室的一些病人，要是早先不延期手术的话，他们的危险完全可以避免。

虽然病人推迟或放弃医治，医疗保险公司可以省钱（Abelson, 2011a），但是，这些个体选择也可能会引发一连串事件，产生危险的结构后果。选择性手术占到医院收入的 25%（Sack, 2009）。大量病人决定取消或推迟手术损失的收入——在一所中等教学医院（即医学院附属医院）估计每年接近 100 万美元（Caramenico, 2012）——迫使一些医院通过裁员来降低成本，推迟扩张，取消设备更新，并减少服务，如急性照护、会诊和病人教育。结果，医院护理质量开始恶化，进而也就给所有患者都带来了具有潜在危险性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如果我们将国家视为演员、将地球视为个体所属的社群，许多具有全球影响的问题，如能源短缺、大规模气候变化、物种消亡，也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得到理解。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两类重要的社会困境：公有地悲剧和搭便车问题，它们既在地方层面存在，也在更大层面存在。

公有地悲剧

“公有地”（commons）一词，最初是指位于中世纪城镇中央的公共草地，当地所有牧人都可在此放牧。若每个村民都能善用公有地，青草就会不断生长，牲畜的食物来源也就可以永不匮乏（Hardin & Baden, 1977）。然而，每个牧民很快就意识到，若是放任牲畜多吃草料以增加重量和售价，他或她就可以从中增加获利。但不幸的是，当许多牧民都打算这么做时，公有地的青草生长速度就会赶不上减少的速度，结果悲剧的一幕便出现了：公有地一片荒芜，牧民只能变卖牲畜，或是眼睁睁看着牲畜死去。个人的短期需求遮蔽了群体的长期集体需求。

在这个例子中，公共资源是牧场，群体规模相对较小。但在实际生活中，公有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这一模型，适用于任何必不可少但却有限的公共资源开放给所有人的情境。国际水域的渔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当代例子。如果不是过度捕捞，它们原本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因为总是会有鱼进行繁殖。然而，由于没有强加限制，渔民可以为自己捕捉大量的鱼。对个体来说，这是明显可见的好处，但他或她在这样做时却也无可挽回地破坏了鱼群，破坏了它们的长期生存能力。如果没有人过度捕捞，人们就会倾向于适量捕鱼。然而，一旦有人开始过度捕捞，其他人就也会有很强的过度捕鱼的冲动。因此，鱼群就会受损，鱼儿不再繁衍。简而言之，每个人都做了满足其自身最大利益的事情，但这却对每个人都产生了一个糟糕的结果：水中的鱼越来越少。

或者，也可考虑一下，我们有时在网上传送信息或下载数据时会遇到的恼人的网速变慢现象。这些网络，就像任何其他公共资源一样，并不是无限的。一旦它们达到其带宽容量，如在使用高峰时段，是不够的，每个人都会苦于网速太慢。手机公司和网络运营商对此通常的回应是，扩大承载能力和建设更多的基站。但是，这些补救措施有成本支出（这意味着用户要为其付费更多[买单]），而且将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进一步的电磁限制，这被称为“频谱危机”（spectrum crunch，即增加额外射频资源也都不足以解决问题）。因而，只要我们继续使用我们的产品，无论何时当我们想要给一个站在三米外的朋友发短信，当我们迷失方向查找GPS帮助时，或是当我们为一次社会学考试做准备前去寻找最近的小啤酒厂时，我们就将不得不去应对不可避免的和不便的无线网络拥堵“悲剧”。

在个体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牺牲集体利益以维护自身权利的冲动，往往会变得格外强烈。1993年夏天洪水期间，爱荷华州得梅因地区有条河流，河水溢出河岸，淹没了一个净水过滤系统，危及市政供水安全。必须等待水源浑浊度降低才能恢复完整的供水服务。当时的情况十分紧急。水压不足，不仅居民没有稳定水源可用，消防车也无法作业。当地官员呼吁居民和企业自愿停水数日。如果所有居民都能予以配合，几天

内供水就能恢复正常。然而，就是有些人抵制不住私下偷偷用水的诱惑。最后，许多居民都未听从市政当局的呼吁，致使供水又推迟了好多天才恢复正常（Bradsher, 1993）。个体为了确保自身短期利益的结果就是，整个社群一起受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社会困境呢？部分原因在于，群体成员之间缺少沟通和信任。原本我可能想做个好公民节约用水，但要是我认为邻居们都在囤水，我可能就会跟着囤水。这些行为可能短期内会对我自己有利，但最终却对整个群体都是有害无益。

当个体认为满足自身需求不会对群体有什么明显影响，就会使问题恶化。“我在旱季长时间淋浴真会伤害群体吗？”当每个人或者至少也是多数人都相信这样做不会造成影响，“公有地悲剧”也就会随之形成。当我们集体忽视或淡化行为的后果，就会过度使用资源，虽然不会让哪个个体为此负责，但却终将会引向通往灾难之路（Edney, 1979）。

搭便车问题

当人们无论贡献多少都能获得某项资源而宁愿对共同资源有任何贡献时，社会困境也会形成。既然免费可得，自然也就无人愿意付费。例如，从个人角度来看，把钱捐给公共电视台和广播，是一种不理性的举动。我不花一分钱就能看到《芝麻街》（*Sesame Street*）、《前线》（*Frontline*，波士顿 WGBH 电视台制作的一档关于公众事务的节目，在美国公共电视台 PBS 播出，自 1983 年播出至今）、《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等节目。我的小额捐款，比起公共电视台的总预算，不过九牛一毛。我自己也不愿花费任何不必要的支出。然而，若是每个人都这样做，我们终将失去这项资源。公共电视台和广播若单靠民众捐款，只怕早已不复存在。实际上，它是靠成员站费用、大学资助、公共广播公司联邦基金、企业赞助来维持运转。

社会学家有时将这种类型的社会困境称为搭便车问题（free-rider